

陶瓷所見十七世紀的 福爾摩沙

／謝明良

一、前言

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臺灣，做為當時世界貿易體系中的一個據點，其活絡的商販活動於文獻史料，特別是在荷蘭、英國、日本方面的檔案文書中有著極為生動和詳細的描述。當時，由臺灣轉口輸出的貿易品目種類不少，陶瓷只是當中的一項。自荷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二四年在臺灣赤崁設立貿易據點以來，即以臺灣做為連接中國、日本或東南亞、歐洲諸國的基地，努力經營陶瓷貿易。比如說，一六三五年三月至七月間，由荷蘭所

屬臺灣商館運往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的中國陶瓷計十三萬件，同年八月從臺灣運抵日本長崎的陶瓷也有十三萬件；一六三八年巴達維亞更有八十九萬件由臺灣載運來的陶瓷準備銷售到荷蘭和印度。（註一）繼荷蘭人之後，佔據臺灣的鄭成功同樣對陶瓷貿易不遺餘力，他也是以臺灣安平為據點將中國貨物運銷日本或東南亞國家，同時又將日本佐賀、長崎一帶肥前國燒造的所謂伊萬里陶瓷輸往東南亞。問題是，文獻記載之外，臺灣的考古發掘對此是否也有所反映？本文的目的，首先是想介紹一九八〇年

代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著手發掘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陶瓷標本，因為該遺址出土陶瓷的組合情況確實能夠反映十七世紀福爾摩沙的國際性。另一方面，由於臺灣歷史時期考古工作做的不多，所以我想藉由遺留在臺灣古厝的傳世陶瓷來彌補考古出土標本的不足。

二、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安平壺

一九八八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著手發掘的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是臺灣難得一見經正式考古發掘的歷史時期遺址。依據報告書所引用《高雄市舊地名探索》，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內傳說即鄭成功所設軍屯前鋒尾之所在地。舊城目前仍殘存數段城垣和三座城門，此次發掘的兩處探方，選擇在東門與南門之間，主要也是考慮到該區域與鄭氏軍屯前鋒尾的地理位置最為接近。兩處探方除了出土若干鐵器、玻璃器、金屬胎琺瑯、銅錢和史前陶片之外，以總數達三千七百餘片的歷史時期陶瓷標本構成遺址出土物的主要內

容。包括後者在內的遺物，已由負責發掘工作的臧振華、高有德、劉益昌三位先生，參酌出土層位，進行了科學的分類和大致的年代判斷，並由臧氏撰寫報告書公開發表。（註二）

遺址出土陶瓷以中國製品居絕大多數，其中包括了日本統治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於熱蘭遮城即安平古堡遺址大量出土，因出土地而命名的所謂安平壺（圖一）。安平壺在臺灣出土地點不少，並且多和西班牙



圖一 安平壺 十七世紀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



圖三 安平壺 荷蘭白獅號沉船(1613年)

可尋覓到安平壺的蹤跡(圖三)。(註三)上述資料表明了所謂安平壺的施釉罐之年代主要集中在十七世紀，而十七世紀荷蘭的臺灣商館主要就是為了便於採購輸往日本或銷往印尼再轉輸歐洲的中國商品而設置的，鄭成功也是以臺灣為基地與日本和東南亞等地國家進行貿易。由於臺灣出土有安平壺的遺跡多和荷蘭人、西班牙人或鄭氏一族的活動範圍有關，若結合海外安平壺的出土分布，似乎顯現了當



圖二 安平壺 十七世紀 上：安平古堡表採
下：新竹明新工專表採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人、荷蘭人在台灣構築的要塞城址、主要活動範圍或鄭成功在臺灣的統治地域有關。比如說西班牙人於一六二六年在雞籠港(基隆)港內社寮島(和平島)建築的聖救主城(San Salvador)或一六二八年在淡水建造的聖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遺址範圍都見有安平壺標本。至於前述荷蘭人於一六二四年在安平構築的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或一六五三年在赤崁建立的普羅文查市(Provincia)區域範圍內更是安平壺頻繁出現的地區(圖二)。雖然安平壺是中國陶瓷史上唯一以臺灣地名命名的陶瓷，但其

造型、釉色或尺寸大小不一而足，顯然是來自複數窯場所生產。但是各作品之間卻也有一些共通的造型特徵，即大多呈小口、折肩或弧肩，肩以下弧度內收成小平底，底足露胎，其餘部位施罩微泛青灰色或偏黃的白釉。器胎有厚胎和薄胎兩類，無論何者均採兩段接合成形，所以在作品肩腹之間存在有明顯的接痕。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左營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安平壺是屬於厚胎類型，相對的，台南安平地區似乎以薄胎者居多。

應予留意的是，除了日本長崎市出島荷蘭商館、平戶市荷蘭商館等十七世紀遺跡之外，爪哇萬丹(Banten)和越南化德島(Con Dao)也都出土了安平壺，後者化德島遺跡推測也是和十八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設施有關。另外，菲律賓賓八打雁(Batangas)幸運島海域打撈上岸的一六〇〇年沈沒的西班牙旗艦聖迄戈號(San Diego)或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發現的荷蘭籍白獅號(Witte Leeuw)以及相對年代分別在一六四〇年代的哈察號(Hacher Junk)和一六九〇年代的越南頭頓發現的頭頓號(Yung Tau Cargo)等沈船也都

時以臺灣為據點的對外貿易網絡。就此而言，傳說是鄭成功所設軍屯前峰尾所在地的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不僅出土有安平壺，更重要的是該遺址同時又伴出有日本和疑似東南亞越南等地的陶瓷標本，我認為，其陶瓷組合情況正是當時以臺灣為據點的東亞貿易交流於考古學上的反映。

三、遺址出土的日本青花瓷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日本青花瓷，青料發色淡雅，碗壁繪花卉紋，圈足底書「宣明」款識，是來自九州有田地區所燒製的所謂伊萬里燒(圖四)。此一稱謂是由於有田生產的陶瓷多由伊萬里港裝載泛洋，因此當時的瓷商或消費地的人們就以裝運地點泛稱這些陶瓷。有田窯是朝鮮歸化陶工李參平於十七世紀初期所創立，是日本最早燒造瓷器的窯場，其自一六五九年(日本萬治二年)接受出島荷蘭商館定製燒造三萬多件瓷器以來，已正式進入蓬勃的外銷時代，並逐漸取代中國原有的海外陶瓷市場。早期伊萬里燒經常以明代晚期青花瓷或《八種畫譜》等繪本做為參考或模仿的依據，故作品裝飾作



圖六 褐釉平口罐 十七世紀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



圖七 褐釉平口罐 十七世紀 日本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

四、遺址出土「褐釉粗陶」的產地問題

左營舊城遺址出土的報告書所謂褐釉粗陶，包括有：無釉唇口素燒陶盆、褐釉雙簷罐和褐釉平口罐（圖六）等器形。其中，褐釉平口罐曾見於日本中世著名貿易港口環濠都市遺跡。（圖七）後者標本出土於一六一五年（日本慶長二十年）燒土層，報告者認為是越南所燒製的外銷瓷。（註六）另外，越南頭頓巴麗亞省（Baria-Yung Tau）化德島（Con dao）一處推測是十八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設施

的遺址中，也採集到不少同類褐釉平口罐標本，並且伴出了安平壺以及其他十七世紀末期的中國陶瓷。（註七）安平壺與褐釉平口罐的共存組合同時見於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是應予留意的現象。此外，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唇口素燒陶盆和褐釉雙簷罐，亦見於國外公私收藏，過去日本學者依其胎釉等特徵，認為其可能亦屬越南陶瓷。

雖然《熱蘭遮城日誌》等十七世紀文獻記錄了鄭成功所擁有的船隻曾經赴東京（越南北部）、廣南（越南中部）等地貿易，日本的朱印船也經常



圖五 日本 伊萬里燒 十七世紀 佐賀縣有田町長吉谷窯出土



圖四 日本 伊萬里燒 十七世紀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

風與中國陶瓷有類似之處。不僅如此，佐賀縣山內町燒瓷於十七世紀三〇年代至五〇年代的窯の窯，更出現了書寫「大明成化年製」等中國年號的作品。隨著十七世紀後半伊萬里瓷器的大量外銷，作品的銘款種類也趨於豐富，除了有「大明嘉靖年製」、「宣德年製」、「大明年製」等之外，更出現了將宣德的「宣」字、大明之「明」字兩者複合而成的「宣明年製」，或是如左營舊城遺址出土的只書「宣明」的合成款識（圖五）。從佐賀縣有田町長吉谷窯所見帶有該一款識青花碗的編年可知，其相對年代約在十七世紀六〇至八〇年代之間，（註四）並且有可能是一六六〇—一六七〇這十年間的產品。（註五）此一年代極具意義，因為該作品正是屬於清廷為杜絕海上走私貿易，同時企圖孤立鄭氏集團而於一六六一年採行的遷界措施，至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軍進攻臺灣，鄭克塽戰敗投降，翌年頒佈展海令允許中國沿海人民出海貿易這一期間的作品。換句話說，也正是日本伊萬里瓷器因中國局勢而順勢取代中國陶瓷外銷市場這一期間的作品。

往返於臺灣和東南亞，因此若說做為連結當時中國、東南亞、日本之間貿易據點的臺灣出土有東南亞陶瓷，或許也是理所當然。不過，由於越南的窯址發掘調查工作至今未能全面展開，故有關舊城聚落等地遺址出土的褐釉平口罐等作品的產地，目前仍限於從作品本身的外觀特徵進行間接的釐測，未有明確的窯址出土資料可資比對，是故近年來日方學者已重新檢視以往視為越南燒製的前述褐釉平口罐等作品，改絃易轍地認為其可能是來自中國窯場所生產。(註八)

五、遺留在台灣民間的 東南亞陶瓷

雖然左營舊城遺址是否出土越南陶瓷仍有待證實，但是留存在臺灣民間古厝的東南亞陶瓷的數量似乎不少，只是以往未能將它和臺灣或中國、日本的陶瓷區分開來，進而辨識其產地。儘管這些作品並非考古發掘所得，其具體流傳過程亦多難以查證，不過民間學者的訪察記錄仍然為探索十七世紀臺灣和東南亞的貿易往來留下重要的線索。



圖八 台灣古厝所見越南陶瓷 十七世紀

我們只要翻閱一九七〇年代出版的劉文三著《臺灣早期民藝》就會驚訝地發現由作者走訪臺灣民間親自拍攝甚至收購的陶瓷器當中，就包括了越南和泰國的陶瓷。比如說，一件高溫素燒的廣口四繫溜肩平底罐，口沿略呈唇口，口部下方肩部部位飾三道凸弦紋，弦紋之間陰刻波狀梳紋，並於對稱部位安四只繫耳。繫耳和凸弦紋下方另飾四道陰刻複線紋，複線紋之間裝飾有淺陰刻的波形梳紋(圖八)。(註九)類似的標本於日本長崎市榮町遺跡(註十)或兵庫環濠都市遺跡(註十一)亦曾出土(圖九)，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其應是十七世紀越南



圖九 日本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的越南陶瓷 十七世紀



圖一〇 日本傳世越南陶瓷 十七世紀 三井文庫藏

北部窯場所生產。(註十二)由於該類作品輸入日本之後頗受茶道界的歡迎，因此也成了日本茶道的用具之一，如室町三井家傳世現藏三井文庫的一件與前述臺灣民間所見四繫罐造型、裝飾一致的所謂南蠻水指，即是著名的茶道具。(圖一〇)(註十三)「南蠻物」或「島物」是室町(一三九五—一五七三)後期至江戶時期(一六一五—一八六七)對暹羅(泰國)、呂宋(菲律賓)、爪哇和南洋群島土產或經由上述地區輸入日本之西歐物品的泛稱，並據此與主要意指中國的「唐物」予以區別。考慮到十七世紀臺灣和東南亞、日本的三邊貿易，同時臺灣傳世或日本考古遺址所見越南陶

瓷種類有雷同之處，我推測日本出土或傳世的東南亞陶瓷當中，可能有一部份是經由臺灣而後轉運到日本的。事實上，日本安政元年(一八五九年)田內梅軒著《陶磁考》就提到：由於當時日本經常無法辨別來自呂宋(菲律賓賓)、交趾(越南)以及臺灣等諸國的陶瓷，因此就將上引包括臺灣在內的各國陶瓷以「玁物」(島物)或「南蠻物」概括之，以便和主要來自中國的「唐物」進行區別。

越南陶瓷之外，臺灣民間古厝亦見泰國陶瓷的蹤跡，如前引劉氏著作中的一件廣口四繫罐即為一例(圖一一)(註十四)。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其主要是由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dhya, 即大城)一帶窯場所燒製。(註十五)該類四繫罐曾見於暹羅灣打撈上岸的Pattaya wreck(註十六)和Ko Si Chang 等沈船(註十七)，從Pataya或Ko Si Chang等沈船伴出的所謂卡拉克瓷(Krak Porcelain)可輕易得知此式四繫罐的相對年代應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前期。關於這點，我們還可從前引伴出有安平壺的一六一三年沈沒之荷蘭白獅號Witte Leeuw(註十八)或一六〇九年模里



圖一一 台灣古厝所見泰國四繫罐 十七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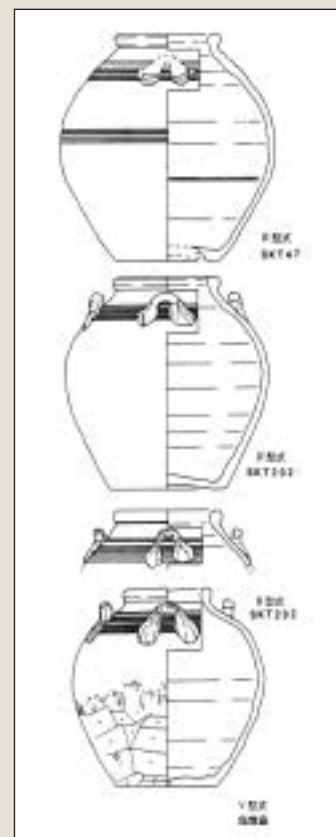
圖一四之二 日本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的泰國四繫罐

西斯號 Mauritius (註十九) 等沈船中也發現同類四繫罐一事得到必要的檢證(圖一二)。另一方面，日本島根縣富田川或五環濠都市遺跡等許多考古遺址也都出土有同類四繫罐。依據日方學者結合考古地層和文獻記載的器式編年方案，則被歸入Ⅱ式和Ⅲ式等兩式作品和前引遺留在台灣古厝的四繫罐造型最為類似(圖一三)(註二十)，而Ⅳ、Ⅴ兩式作品之相對年代，也是在十七世紀初期至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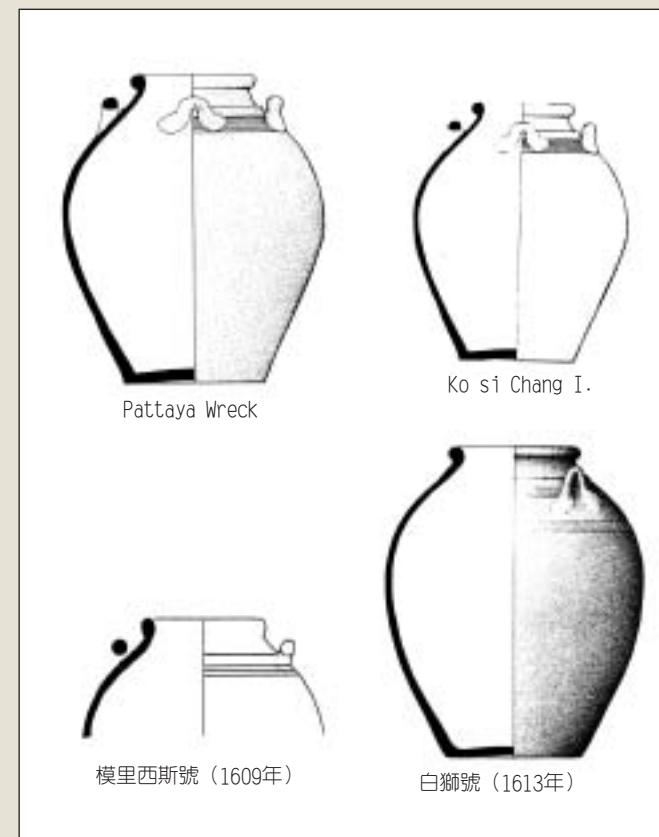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十七世紀的台灣是荷蘭人和鄭成功往來於日本和東南亞貿易商船的主要轉運站。一六二九至一六三四年任荷蘭東印度公司暹羅商館長之范符立特 (Van Vliet) 著《暹羅國志》就記載：「粗細瓷器及其他中國貨乃由公司之船隻從臺灣 (Tajouan) 或由兩三艘戎克船從漳州 (Chin Scheuw) 每年運抵此地」，可知暹羅所使用的陶器器皿有的是仰賴進口。另一方面，暹羅土產香料、檳榔子或硝石則被轉銷往日本及中國等地。依據英國東印度公司駐暹羅職員懷特 (George White) 於一六七八年向倫敦本公司所提出的報告：「每年有大批硝石由廈門王 (King of Amoy, 即鄭經) 及交趾支那王 (即廣南阮王) 之代理商運返其國」以供前者對韃靼人 (滿清人)，後者對東京人之長期戰爭使用(註二二)，荷蘭暹羅商館於一六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報告也說：「今年有二艘戎克船來到暹羅，而受了國姓 (Coxin) 的命令，回歸中國。：均裝載硫黃、硝石、鉛、米和其他各種乾糧回去」(註二二)，則暹羅產硝石是鄭氏家族軍需火藥的來源之一。應予留意的是，前述日本五環濠都市遺跡中的倉庫遺跡所出土的五件和臺灣古厝造型特徵大體一致的十七世紀泰國四繫罐當中，有兩件罐中仍裝盛有硫黃(圖一四)。若結合前引鄭氏家族向暹羅購進硝石、硫黃一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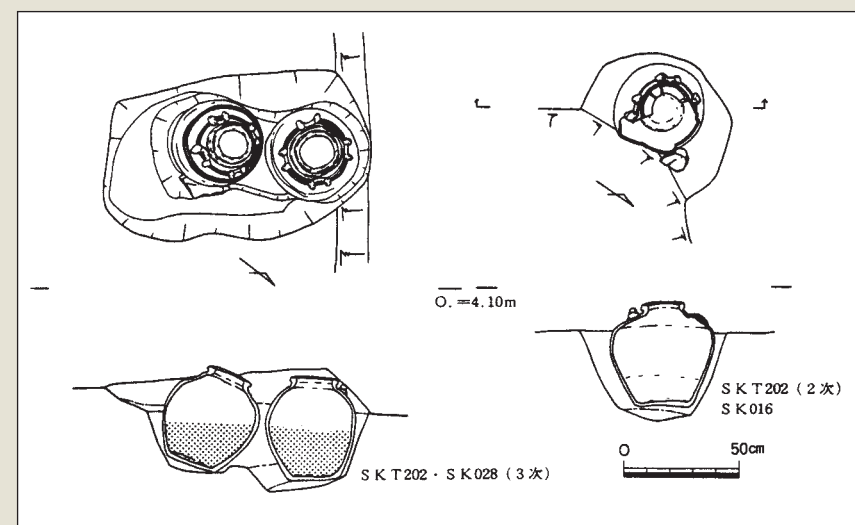
圖一四之三 日本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的泰國四繫罐



圖一三 日本遺跡所見泰國四繫罐 IV式、V式 十七世紀



圖一二 沉船所見泰國四繫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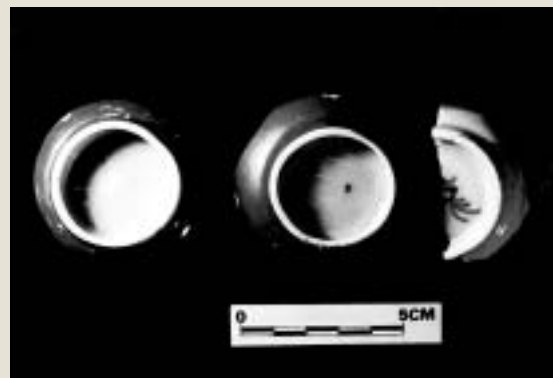
圖一四之一 日本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的泰國四繫罐 線繪圖左下黑點部分表示硫黃



圖一七 帶「大明正德」刻銘的安平壺
台灣私人藏

也不限於單一用途，也就是說除了頭頓號沈船所見裝盛什物外銷之外，安平壺還被做為一種簡略的墓誌替代品，於燒成後的壺身釉上鑿刻出死者姓名或生卒年陪葬入墓。這類鑿刻銘文的物品目前不見於正式的考古發掘報導，但由中國走私流入臺灣古物市場的數量卻不少。由於銘文是燒成之後才加刻，因此很難完全排除近人偽刻的可能性，但若考慮到明代後期至清代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既流行於青花瓷盤外底墨書誌文，也常見在青花蓋盒盒內鑿刻墓誌文，後者鑿刻技法與前述刻銘安平壺一致，因此或許亦可將上述諸例理解為是中國民間就近將唾手可得的日常陶瓷轉用於墓葬儀物之例？就我個人的見聞而言，安平壺

所見刻銘紀年最早的是明代正德（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年間（圖一七）。如前所述，左營清代鳳山舊城聚落遺址共伴出土了日本和中國瓷器，以及疑似越南燒製的陶瓷。相對於中國的考古遺跡未有這樣的陶瓷出土組合，日本長崎市榮町、築町等遺跡則均共伴出土了安平壺和伊萬里瓷以及越南或泰國等地陶瓷。（註三一）其次，左營舊城聚落遺址還見有一類於器外壁施褐釉，內壁繪飾青花的作品（圖一八）。由於該類作品經常經由巴達維亞轉販各地，故又有巴達維亞瓷（Batavia ware）之稱，而長崎市位於出島荷蘭商館對岸的銅座町遺跡也出土了這類陶瓷，並伴出了安平壺和荷蘭的陶瓷。（註三二）另外，發掘雅加達灣西部沿岸叭沙伊干（Pasari Kan）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和舊河道遺跡時，除了出土有上述巴達維亞瓷、伊萬里瓷之外，其伴出的青花菊花纏枝碗也和左營清代鳳山舊城聚落遺址標本一致。（註三三）事實上，近年井隆已針對左營舊城聚落遺址以及印尼萬丹遺址出土陶瓷標本進行了分類比對，結論認為前者遺跡出土之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陶瓷當中，至少



圖一八 外施褐釉裏繪青花瓷 十七世紀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

以上約略地介紹了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出土的日本和中國陶瓷標本，以及流傳於臺灣民間的越南和泰國陶瓷。雖然，考古發掘已證實中國福建邵武青雲窯是所謂安平壺的燒製地點之一（圖一五），（註二四）不過，包括左營遺址在內的臺灣出土或傳世的安平壺造型、釉色多樣，顯然是來自複數窯場所生產。另一方面，有關這類在日治時期每當「發掘熱蘭遮城就會出土」（註二五）的安平壺之用途，歷來眾說紛紜，未有定論。其中又以火藥罐說，即連橫

六、小結

來，不排除遺留在台灣的該類四繫罐有的或是由暹羅所進口之內裝硝石一類的外容器？不過，目前仍難確認在環濠都市倉庫遺跡四繫罐的使用方式是否為消費地改變用途所致？其次，我們也不應忽視暹羅灣沈船發現的同類壺中內裝魚干的這一事實。（註二三）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四繫罐中的內容物才是當時貿易的項目，四繫罐本身應該只是做為商品的外容器，而非鑑賞收藏的對象。

所提到的清代火藥局內還可見到尚未開封的安平壺之說法最廣為人知。（註二六）應予留意的是，前引一六九〇年代頭頓號沈船 Vung Tau Cargo 就打撈出以黑色膠狀物包裹壺口，而後再以藤莖捆繞壺頸加固的安平壺標本（圖一六）。（註二七）如果說頭頓號沈船的包裹方式是代表了安平壺是做為某種外銷品物的外容器，那麼臺灣平埔族西拉雅人（Siraya）以安平壺做為阿立祖（Ariti）公廨祭壇神靈憑靈的道具；（註二八）以及日本小濱寶遺跡出土之於罐內置骨質聖母瑪麗亞像；（註二九）長崎市築町遺跡罐內填充鐵屑（註三十）等事例，則是外國消費地對原產國器物功能的改動，即二次性的用途改變和利用。其實，做為原產地的中國之於安平壺的使用



圖一五 中國福建省邵武青雲窯址的安平壺 照片由坂井隆先生提供



圖一六 做為容器的安平壺之包裹方式
越南頭頓號沉船打撈品
十七世紀

荷蘭人運抵臺灣商館的陶瓷標本，其次日本和東南亞陶瓷的發現例子似乎也不多，但是我們應該留意台南市延平郡王祠文物館的陳列櫃中既有安平壺，也包括了十七世紀日本伊萬里青花瓷（圖一九）；（註三六）台南市立安平文化中心也陳列有打撈自臺灣海峽年代可早自十五世紀的東南亞陶瓷（圖二〇）。據說，開墾台南安平之間運河時，也曾出土大量的泰國陶瓷。（註三七）但遺憾的是，以往包括我在內的臺灣相關從業人員，既然缺乏日本、東南亞陶瓷相關知識，就有可能會不夠警覺地將來自複數國家的作品，全部誤判為中國製品而不自知。因此，設若重新檢視以往臺灣考古出土標本或傳世遺物，估計將可識別出更多屬於日本或東南亞甚至歐洲的陶瓷，進而為探索十七世紀福爾摩沙的貿易網絡和具體交易內容提供線索。

註釋：

一、山脇悌一郎，〈唐、蘭船の伊萬里輸出〉，收入：《有田町史商業編Ⅰ》（佐賀縣：有田町史編纂委員會，一九九八），頁二六七。



圖一九 流傳於台灣的日本伊萬里燒 十七世紀
台南延平郡王祠文物館藏

有十七種類與萬丹遺址出土標本一致，後者萬丹遺址當中至少有三個遺跡伴出了安平壺。（註三四）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和印尼遺址出土陶瓷標本的雷同性，令人印象深刻。

這樣看來，左營舊城聚落遺址出土陶瓷之組合特徵，既與中國考古遺跡所見者截然不同，但是卻和印尼或日本遺址所出標本組合有共通之處。其實，十七世紀銷往歐洲的中國陶瓷一般多先運抵臺灣而後轉送至巴達維



圖二〇 打撈自台灣海峽的東南亞瓷器 台南市立安平文化中心藏

亞；相對的，由日本航向東南亞的商船也經常以臺灣為轉接據點，如一六六一年十二月載運有三萬餘件日本伊萬里瓷的商船即是由日本出島啓航經臺灣駛往巴達維亞；一六六九年十一月也有一萬八千餘件陶瓷自出島運抵臺灣（註三五）。因此，左營遺址出土陶瓷可說是如實地反映了臺灣在當時國際貿易網絡中的角色和地位。

雖然，目前臺灣考古發掘仍未尋覓十七世紀中國接受歐洲人訂製、由

- 二、臧振華等，〈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四本第三分（一九九二），頁七六二—八六五。
- 三、關於安平壺的出土發現地點及其器式分類，可參見：謝明良，〈安平壺芻議〉，《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二（一九九五），頁七五—一〇五。
- 四、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台灣史研究》三卷一期（一九九七），頁二一九—二四四。
- 四：坂井隆，〈台灣のイマリ—十七世紀後半の交易據點—〉《陶說》五三三（一九九七），頁二四—三六。
- 五、大橋康一，〈鄭成功とイマリ〉，《目の眼》二六一（一九九八），頁六四。
- 六、續伸一郎，〈塚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一）—出土陶器の分類を中心として〉《貿易陶磁研究》一〇（一九九〇），頁一四七—四七三。
- 七、森本朝子〈日本出土のベトナムの陶磁とその産地〉《東洋陶磁》一三三—一三四（一九九五）頁八四圖—二頁四九。
- 八、森本朝子〈ベトナム陶磁研究の現状—近年の古窯址發掘の成果を中心に〉，收入：《東南アジアの茶道具》（京都：茶道資料館，二〇〇二），頁一九〇。
- 九、劉文三，〈台灣早期民藝〉（台北：雄獅圖書公司，一九七八），頁六一彩圖。

- 十、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榮町遺跡—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査報告書—》（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一九九三），p.166—167。
- 十一、續伸一郎，〈塚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ベトナム陶磁器〉，收入：櫻井清彦等編，《近世日越交流史》（東京：柏書房，二〇〇二），頁一九〇—一九一。
- 十二、森本朝子，〈ベトナムの古窯址〉，收入：《南蠻、島物—南海請來の茶陶》（東京：根津美術館，一九九三），頁一三九。
- 十三、前引茶道資料館，《東南アジアの茶道頁》頁三三—三六。
- 十四、劉文三，前引《台灣早期民藝》頁五七—七〇。
- 十五、吉良文男，〈東南アジア大陸部の陶磁器—タイを中心に〉，收入：前引《東南アジアの茶道頁》，頁二〇—二二。
- 十六、Jeremy Green and Rossmay Harp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v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 1982, p.56-650.
- 十七、森村健一〈十六—十七世紀初頭の塚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四耳壺—タイでの窯跡、沉没船の出土例—〉《貿易陶磁研究》九（一九八九），頁一三四—一五一。
- 十八、G. C. Vander pijl-ketei,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 Museum, 1982), p.239
- 十九、M. L'Hour and L. Long, *The wreck of an 'experimental' ship of t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The Mauritius (160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19-1 (1990), p.68-fig.49.
- 二十、續伸一郎，〈塚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製四耳壺〉，《貿易陶磁研究》九（一九八九），頁一三—一三三。
- 二一、以上兩條文獻是轉引自：陳荆和，〈十七世紀之暹羅對外貿易與華僑〉，收入：凌純聲等編，《中泰文化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一九五八），頁一五二及頁一七五。
- 二二、曹永和，〈從荷蘭文獻談鄭成功之研究〉，收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三七九。
- 二三、森村健一，同註十七，頁一四〇。
- 二四、傅宋良，〈邵武四都青雲窯址調查簡報〉，《福建文博》（一九八八），頁一〇—一六。
- 二五、國分直一，〈壺を祀る村〉（東京：三省堂，一九四四），頁一一。
- 二六、朱鋒，〈宋碕（安平壺）〉《台南文化》二—一（一九五二），頁五一，引連橫〈臺灣考古錄〉。
- 二七、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 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1992) 21-3, p.233. 另外，清楚彩圖可參：見Christiaan J. A. Jorg, Michael Flecker. *Porcelain from the Lung Tau Wreck. The Ha11strom Excavation*, Sun tree Publishing Ltd. UK, 2001, p.151.
- 二八、江家錦，〈從祀壺來談西拉雅族的信仰〉，《南瀛文獻》三七一、二（一九五五），頁一九。
- 二九、天草切支円館《資料目錄》（本渡市，一九九四），轉引自：坂井隆，〈安平壺の貿易—十七世紀の東南アジア貿易ノート—〉，《東南アジア考古學》十五（一九九五），頁一〇五。
- 三十、長崎市教育委員會，《築町遺跡—築町別館跡地開發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査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教育委員會，一九九七），頁三三—三九。
- 三一、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同註十，頁六六—七五；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同註三十，頁五一—五九。
- 三二、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銅座町遺跡十八銀行本店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報告書》（長崎市：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査協議會，一九九三），圖版一〇之六三、六六、六七。
- 三三、同上次男，〈パサリカン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二（一九八二），圖一一—一五。
- 三四、坂井隆，〈東南アジア群島部の陶磁器消費者〉，《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九四（二〇〇二），頁二二—四。
- 三五、T. Volker著（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陶說》三四九（一九八二），頁六六—三五二（一九八二），頁六八—三五六（一九八一），頁八四。
- 三六、兩件青花瓶屬一六五〇—一六七〇年代日本肥前地區燒製的伊萬里瓷一事已由大橋康一、坂井隆兩人所指出。參見：大橋，同註五，頁八六圖五，以及坂井隆，《港市國家バンテンと陶磁貿易》（東京：同成社，二〇〇二），頁二二—二八。
- 三七、小西雅德，〈タイ陶磁器の輸出地域について〉，《國學院大學考古資料館紀要》三（樋口清之博士喜壽紀念，一九八七），頁二八。

